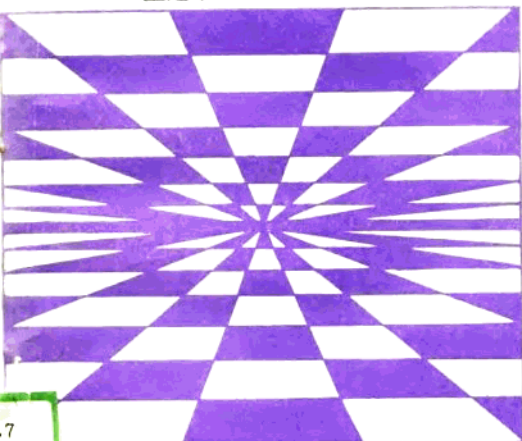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史研究文集

董建中 张守宪 主编



7

天 则 出 版 社

浩、肖志鹏等老师的帮助，还得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领导、社会科学系、教务处、科研处、研究生部、印刷厂等单位 and 天则出版社的热情支持，特致衷心感谢。

我们在编写中，参阅并吸收了同行专家、学者的有关论著中的一些史料和观点，特作说明并致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文集》中缺点、错误一定不少，敬请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教。

编者 1989年3月

目 录

我是怎样研究五四运动史的? (代前言)	彭 明(1)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新考	董建中、刘兴潮(13)
五四时期改造中国社会的探索	董建中(22)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董建中、唐兆顺(36)
论北伐战争的领导权	董建中、张守宪(48)
关于蒋、汪会谈与汪、陈宣言	董建中(64)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国际和 中国革命	张守宪(71)
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	董建中(86)
关于反“罗明路线”的几个问题	黄朝章(97)
李铁夫与所谓“铁夫路线”	董建中、张守宪(109)
关于红军长征中的 几个问题	杨 浩、刘兴潮、董建中(121)
论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对 中国革命的贡献	房成祥(136)
宋美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 作用	李学诗、董建中(146)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酝酿、形成 及其特点	丁雍年、董建中(156)
全面抗战爆发前的蒋日矛盾和南京政府 的对策	李振民(173)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几项 经济政策	丁雍年、董建中(191)

官僚资本的形成、膨胀及其特点	魏云山 (206)
抗日战争时期苏美对华政策	李学诗 (217)
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历史贡献	董建中 (235)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工作述略	胡民新 (254)
战后国际关系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徐乃杰 (261)
重庆谈判	董建中、杨 浩 (267)
美国对华政策和政治协商会议	丁雍年、肖志鹏 (286)
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失败与经济崩溃	丁雍年 (300)

我是怎样研究五四运动史的？

(代前言)

彭 明

1979年五四运动60周年之际，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我的两本小书：《五四运动论文集》和《五四运动在北京》。此后不久，某刊物编辑部就要我写一篇同青年人谈治学经验的文章，而且命题为：《我是怎样研究五四运动史的？》不过，我迟迟未敢动笔，因为感到自己才疏学浅、人微言轻，对青年不会有什么帮助，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五四运动史》一书尚未写完，谈经验未免为时过早。

我在上面两本小书的“后记”中都表明了这样的愿望：“将来如果条件许可的话，我愿意在科学的道路上重新起步。”意思是说，希望在那两本小书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争取完成一本可读的书。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五四运动史》就是近几年来在那两本书的基础上继续研究的成果。书成之后，总要有了一篇序言或后记之类的文字，向读者交待写书的经过。因此，我写下了《我是怎样研究五四运动史的》这篇文章，算是应答某刊物编辑部指定的题目，同时也算是这本书的前言吧！

我是怎样选择五四运动这个题目的？

话要从三十多年前说起。

1946年，我在华北联大教育学院史地系学习。那年的“五四”青年节，我们的老院长兼系主任于力(董鲁安)同志，在《北方文化》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北京高师参加五四游行示威的情况》，讲述了他参加五四运动的经过。这篇文章引起了我对五四运动的兴趣，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开始了积累“五四”资料的工作。

1956年，我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五四时期的报刊和回忆录，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愈来愈感到五四时期这段历史的重要性；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时期传入或兴起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五四时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如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等，追根溯源，都是从五四时期发端的。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太平天国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两大转变时期的标帜。如果说太平天国运动揭开了中国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而五四运动则是揭开了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成为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我国历史学界对于太平天国的研究是比较充分的，如罗尔纲同志在三、四十年代便从事过系统的研究，写下了大量著作。而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相比之下，则是比较薄弱的。六十年代初，我看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的一本长达数十万字的《五四运动史》(周策纵著，1960年英文版)。这本书激起了我也想写一本《五四运动史》的愿

望:外国都有了,中国为什么没有?

愿望虽好,但有没有可能实现呢?主要是资料问题,根据多年摸索的经验,感觉资料还是比较丰富的,如档案、报刊、文献等文字资料,当事人回忆的活资料等也都是不难获得的,只要肯付出艰苦的劳动,便会产生出一定的成果。

为此,我从1961年拟提纲开始,除1964年下去“四清”外,算是没有中断地为《五四运动史》工作了五年。到1966年初,共得稿将近30万字,算是打下了这本书的基础。

因此,当青年朋友们问我治学经验,即如何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时候,我认为:选题是中心的一环。

选题必须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必要,一是可能。道理十分明白:你所研究的问题如果对别人没有用处,社会并不需要,你所研究的问题已是众所周知的道理,并不能在历史科学宝库中增加任何新东西,那有什么研究的必要呢?因此,在定题以前,必须先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查阅一些文献资料,看前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研究到了什么程度,还有那些问题需要继续研究。选题除考虑必要性外,还要考虑可能性。材料准备怎样?理论准备怎样?都要有些预见。不然的话,便可能产生停工待料以至半途而废的情况。

我是怎样收集资料的?

题目选定之后,就要大力从事收集资料的工作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资料是谈不上研究的。马克思说:“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只有在完成这种工作之后,实际的

运动方才能够适当地叙述出来。”(《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我的资料来源不外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报刊资料。在五十年代编写教材时我就将五四时期的主要报纸和刊物初步地阅读了,到六十年代提纲拟成后,又分章分节分段地补读了应该看到而尚未看到的一些报刊。在这方面我应该十分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等单位的大力协助,报刊资料是当时的文字记录,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历史的基础资料。

第二,档案资料。报刊资料是重要的历史资料,但并非都是可靠的资料,因它总带有一定的宣传性质,由于各自的立场、角度、动机和时机的不同,报导混乱以致失真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后还得靠档案资料才能解决问题。如五月四日当天游行人数问题,李大钊在北大的任教时间问题,等等,都是靠档案资料才弄清楚。在这方面,我应该十分感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北京大学的帮助。特别是二史馆的同志们,从六十年代起就帮助提供了五四时期的全部有关档案资料,使我的研究工作有可能建立在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上。

第三,文献资料。指的是五四时期的一些代表人物的著作、论文、日记、信札等。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运动。对这次运动中的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胡适、吴虞等,一些人的思想,包括青年一代的代表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思想,都是应该认真研究的,对有关他们的上述一些文献资料,都应广泛收集、反复研读。我在研读这些资料时,都随时整理出一些研究札记性的论文,作为写书的素材。

第四，口述资料。指当事人的一些回忆，即活资料。建国以来，集中出版或分散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有关五四运动的回忆录不少，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鲜材料和情况。我对这些回忆录，除认真阅读外，还带着一些问题走访过当年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或目击者，包括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工友、赵家楼胡同的居民、陈独秀故居的房东等。这些活资料非常重要，它可以给你提供许多为文字资料所不具有的细节，给你回答一些不易解决的难题。如高一涵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物的思想和活动情况的提供，许德珩、杨晦等关于学生运动情况的提供，罗章龙关于马列经典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情况的提供，张申府、刘清扬关于周恩来等活动情况的提供，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料。这些历史的见证者，有的已年近古稀，有的则已作古，如1964年春节前夕曾在南京接见我并作过长谈的高一涵同志，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年1月23日)去世了，而我在文章前面提到的“五四”游行中的高师学生于力(董鲁安)同志则早在五十年代就已逝世。因此，深感抢救活资料的迫切性。

除国内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尽量收集外，对于港台及国外出版的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资料，我也尽量收集，作为研究的参考。如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及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等等，都可作为一些史实校正的参考资料。

第五，实地考察。司马迁之所以能写出《史记》那样伟大的著作，一方面是由于他掌握了“石室金匱之书”；另一方面，或者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是和他到处访问历史古迹，进行实地考察“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分不开的，后者补充了前者之不足，解答了前者的疑问，因而才能使“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

公自序》)。

在研究《五四运动史》的过程中，深感实地考察的重要性。我们不可能重新参加五四运动的实践了，但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却应该对历史的遗迹进行必要的考察，增加一些真实感受，作为向后代青年教育的材料。因此，我每读到一段文字资料时，总要尽可能地到发生这些事件的地方去走访。例如，我曾不止一次地走访过《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故居，北京大学当时各科的旧址，毛泽东两次来北京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我也曾不止一次地按照五月四日当日游行的路线从东交民巷走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我不仅自己这样做了，而且在每一次向研究生、学生讲完这一段历史后，也要领着他们这样走一趟，边走边讲，青年人说这样学历史印象深刻，很受教育。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通过实地考察，确能纠正书本上或传闻上的一些谬误。例如在文字记载中，《新青年》编者当年曾在“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我原来听说“新世界”就是前门外的劝业场，但经过实地的访问调查，发现不对了，不是劝业场，而是珠市口西香厂路口的一座楼房(原为一小学，现准备拆除)。当年北京的“新世界”，类似上海的“大世界”游艺场。通过两次访问(第一次承一位小学教师接待，第二次承小学的一位老工友接待，这位老工友是“五四”当年经常出入“新世界”的一位梨园世家子弟)，并参考了当年报纸上的“新世界”游艺场的广告，使我了解了当年“新世界”的全貌。这样，再来读高一涵的那篇和陈独秀一起在“新世界”散发传单经过的回忆，就活龙活现、印象逼真，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了。

前人说：“行千里路，读万卷书”。我自己行路虽不多，

读书也很少，但我觉得这个方向还是对头的。

以上五个方面，说的是资料来源。如何把这些资料积累起来呢？

首先要强调的是手勤，而且要养成习惯。范老(文澜)强调读书一定要做笔记，他认为读书不做笔记，等于没读。开始我不太理解，后来在实践过程中体会到确属至理名言。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当别人谈起某个问题或某个材料的时候，自己恍惚也曾看过(因为确曾看过)，但一深究，出于何经？据于何典？便张口结舌，答不出来，也查不出来了。这就是没做笔记的原故。徐老(特立)谈自己的读书经验：“不动笔墨不看书”。又有所谓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抄书不如摘录的说法，其意思都是强调要手勤，做笔记。

除强调手勤外，也要有一种科学方法。根据前辈学者的经验和自己的实践，感觉使用卡片积累资料确是一种好方法。我把卡片分为三类：第一类，摘录卡片，一般用在不易借到的书籍和资料上；第二类索引卡片，一般用在手头上有或比较容易借到的书籍和资料上；第三类心得卡片，主要是记录一些在看书和研究资料过程中随时想到的一些观点和问题。

卡片积累到一定的数量后，即可根据自己研究问题的提纲，分类放入卡片箱中，在需要时即可分类提取，用完后再归还原处。听说，国外有的历史学者把卡片一式复印两份，一份按年代排列，一份按问题排列，这样，使用起来就更为方便了。

怎样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

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改造我们的学习》）。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治学的指导思想。如何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分析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如何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解释中国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各种运动、变化的原因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离不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的。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许多具体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破产、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等等，不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就无法正确认识历史，材料只是历史的现象，理论才能解决本质问题。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如果不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去整理，只能是一团乱麻。

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历史著作并不要求过多地罗列语录，更反对脱离史实的空泛议论，而是要寓论于史，把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寓于历史的表述之中。

如何把收集到的资料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实践论》简明地概括了这样一个过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研究工作的过程。

去粗取精。资料收集很多，总不能全部堆积到一本书里去，因此要有取舍。例如五四运动的背景材料，我从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到段祺瑞的反动统治都写了，两个政权的卖国活动资料很多，当然不能面面俱到，什么都写上，因为我写的不是《北洋军阀史》，而是《五四运动史》，因此我就只能取与五四爱国运动有关的签订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换文的两段

资料(又从中点出曹汝霖、章宗祥的卖国相)，为五四运动伏下一条线。

去伪存真。对于说明问题的史料，即所谓论据，必须认真核对，辨别真伪。因为史实错了，立论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例如，我们以往往往把《每周评论》对《湘江评论》的一段赞语，说成是李大钊所写并由此发出一通议论，李大钊对毛泽东如何如何，等等。认真核对以后，发现这段赞语却出自胡适之手。可见，如果史实弄错了，主观设想出来的任何高明议论，也就没有价值了。我们并不要求事无巨细，都去作一番繁琐的考证。但是，重要史实的核对工作，是绝对不可少的。

由此及彼。总的是材料之间的关系，即彼此联系问题。根据我研究《五四运动史》的体会，首先谈谈文字材料和回忆材料之间的关系。文字材料和回忆材料，应该以当时文字材料为主。因为回忆材料是在事过境迁的多年以后回忆的。由于年代久远，记忆不清，或者角度不同，往往许多人回忆同一件事，却差异很大。因此，许多问题必须有当时的文字材料来印证，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在回忆材料中，第一手的材料，即亲身经历，又是主要的。虽然是同时代人，但是听别人讲的，并非亲自经历，这是不能作为主要根据的。在第一手的回忆中，是当时不久的回忆，还是现在的回忆，两者之中，又应以当时不久的回忆为主。道理是不说自明的。虽然同是回忆某个事件，但因所处地位和角度不同，回忆也会是不同的。如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这件事，许多参加者都回忆说当游行队伍到达赵家楼胡同曹宅时，曹汝霖事先闻讯逃跑了。但是曹汝霖却回忆说他没有跑，他说：“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屋(箱子间)”，“这箱子间，一面通我妇卧室，

一面通两女卧室，都有门可通”；当学生“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曹汝霖一亡之回忆》，台北1970年版，第153页）。曹本人的这段回忆，应该说是实情。学生没有找到曹，因此估计他事先逃跑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合事实的。由此可见，我们对一切资料，都要具体分析，进行由此及彼的比较研究，来判断事实的真象。

由表及里，即从现象看本质，要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捉住最本质的东西。从五四时期看来，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虽然数量还不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还不够普遍，但它们却是最先进的阶级、最先进的思想，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方向，为其他任何阶级和其他任何思想所不能比拟的。对一个人物的思想研究也是如此，如《李大钊狱中自述》，如果不透过现象看其本质，就不可能作出公正的评价。

我们写历史要求再现历史真相、分析历史特点、阐明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对资料钻研愈细致，搜集愈全面，则历史真相的复写才可能愈清晰，才可能将其时代精神、思潮趣向、人物动态以至于当时的景象、气氛勾画出来。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分析其特点，阐明其规律，自然而然地得出许多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所有这一切，都是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劳动才能获得的。

文字如何表述

研究成果如何通过文字表述出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写了书，总是想使人家看的。书的内容无论怎么丰富，

如果没人愿意看，或者人家看不懂，那有什么用？司马迁写《史记》，人物、事件写得那么栩栩如生，引人入胜，千古流传，实在令人佩服。当然，历史学不同于文学，不能虚构和夸张。但是在准确(事实)、鲜明(观点)的基础上，文字力求生动些，让人能读得下去，还是应该的。由于有这么一点读书的感受，所以我在五十年代写那本《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故事》(上)时，便力图通过讲故事的体裁来宣传科学的历史。那本小册子出版后，老一辈的历史学家及广大读者曾给我很大的鼓励，使我更坚定了信心。

所以，我在写作《五四运动史》时也非常注意这一点。例如，我在写山东问题时，曾亲自到青岛考察了历史沿革和地形的外貌，并请教了研究青岛史的专家。在写到东交民巷、赵家楼胡同、北大红楼、北大法科、杨昌济寓所、三眼井、《新青年》编辑部、新世界游艺场、陶然亭慈悲庵等地方时，我曾不止一次地到那里去观察、访问，力图将几十年前发生的真情实况，再现在读者的面前。然而，我做得很不够，未能完全达到目的，有许多章节写得还是很呆板。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当继续弥补这些不足。

持之以恒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没有肯下死功夫的人。无论什么事，如果继续收集材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即如最简便而微小的旧有花纸之搜集，也可以观测一时的风尚习惯，和社会情形的一般。(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25页。)

范老(文澜)谈治学，也是经常要人们坐得住冷板凳，而

且要下决心坐上十年。意思是说研究工作持之以恒，必然会出成果。不要三心二意，两天打鱼，三天晒网，一事无成。一是坐冷板凳，一是不要发空论，即不要放空炮，要言之有物。这是范老经常告诫人们的两句话。后来，人们把这两句话概括为这样一副对联：

板凳须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

范老的治学精神和恩格斯的下述教导是完全一致的：“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重温前辈们的这些教导，我是很惭愧的。屈指算来，从1946年收集“五四”资料开始，已经是36年过去了。从1961年算起，也已过去20多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研究工作始终未敢中断。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临后，虽然历尽沧桑，包括去江西干校劳动三年，《五四运动史》的稿子始终未离身边，并在打石头、锯木头、做馒头等劳动之余，不断翻阅和修改。但是，由于自己才疏学浅，功力不够，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成果实在是微不足道的。而且空话仍然很多，观点、材料错误之处也一定不少。“丑媳妇不怕见公婆”，暂就现在这样拿出来，继续听取大家的意见。

——本文是《五四运动史》一书（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的前言（节录）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顾问教授）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新考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董建中 刘兴潮

1919年，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的外交失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这已为众所周知。由于这次外交失败，以后人们在记述中国代表团出席“和会”的活动时，多持否定观点；对代表团中某些成员为争取山东主权所作的努力，对代表团拒签和约的壮举，亦缺乏客观的评价。此外，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席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或有误解。本文根据有关史料，作了一些考证，提出如下浅见，求教于同仁。

一、中国在“和会”的席位不是五席， 而是两席，属第三等国待遇

在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中，对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的情况，大都是这样记述的，中国作为战胜国，派出了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等五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团由五人组成，这是历史事实。但据此便推断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有五个席位，却是误解。事实上，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不是五席，而是两席；在历时数月的和会过程中，中国出席会议的全权代表只有二人。